

# 建构主义视角下“9·11”后美国对伊朗核政策的研究<sup>\*</sup>

郭 丽

(南京林业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研究院, 江苏南京 210037)

**摘 要:** “9·11”以来美伊在核问题上的矛盾表现为两国文化建构基础的不同, 这种不同是由于双方所持有的现实主义集体安全观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冲突实质上是两种文化体系的冲突, 即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为主导的康德文化体系与美伊敌对关系为特征的霍布斯文化体系的冲突。建构主义在解释外交政策上忽略了国家身份建构中的内部因素, 这也是伊朗难以纳入所谓的核不扩散“国际规范”的原因。

**关键词:** 美国; 伊朗; 核政策; 集体安全观; 建构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 D815/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1026(2009) 02- 0027- 04

随着冷战的结束, 在国际关系领域出现了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同的理论——建构主义, 它从社会学视角进行国际政治研究, 关注国际关系中的文化、认同、国际规范、社会学习以及社会实践等社会性因素。建构主义认为,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 文化一词有特定的含义, 指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际间互动、社会学习而拥有的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由于文化形塑影响着国际行为体的认同和利益, 所以文化的变化意味着国际利益的变动, 对于文化内化程度不一的国家来说, 其对国际利益的界定也会不一致。<sup>[1]</sup>建构主义的代表亚历山大·温特在其《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强调的就是国家间的政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sup>[2] 100- 143</sup>

温特提出的建构主义理论包括社会理论和国际政治两部分。社会理论主要阐述的是科学实在论、观念对于权力和利益的建构作用、结构施动与文化的关系, 而国际政治理论以此为基础, 重新界定了国家的本质, 提出国家利益是由身份建构的, 并从宏观层次对三种无政府文化结构及其变化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在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思考时, 我们常会发现: 美国为什么对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采取接受、默认或者视若无睹的立场, 但对伊朗、朝鲜发展核武器却大动肝火, 甚至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包括企图采用先发制人打击的战略来阻止其发展核武器? 在用建构主义来分析这个问题之前, 首先要回答, 为什么建构主义对“9·11”事件以来美国对伊朗

核问题政策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原因如下:

(一)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者强调国际体系文化(或称共有知识、共有期望、共有观念等)对国家的意义, 这正好契合文化因素对冷战后美国对伊朗政策的深远影响。伊朗伊斯兰革命后,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情绪不断发展: 美国把伊朗看作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代表, 称其为“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国”, 对伊朗深恶痛绝; 伊朗领导人也提出“不要东方, 不要西方, 只要伊斯兰”的口号, 称美国为“大撒旦”, 对外推行反美、反西方的极端政策。这就形成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敌对文化建构, 最终成为冷战后美国遏制伊朗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二)主流建构主义极为重视观念的作用, 同时也承认物质性因素的客观存在, 但是他强调客观因素只有通过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才能产生影响行为的意义, 才能具有实质性的内容。<sup>[3]</sup>这就使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美国对中东国家的核政策的态度和采取的政策。假如以色列和伊朗都拥有核力量, 核力量是物质性存在, 对美国来说, 感到威胁的必然是伊朗的核力量, 而不是以色列的核力量, 美国就会对以色列和伊朗的核力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行为。仅仅核力量这种物质性因素是不能解释美国的政策行为的, 只有通过美国相对于以色列和伊朗的不同期望, 即以色列是美国的“朋友”, 伊朗是美国的“敌人”, 核力量才产生了它所实际具有的意义。这就使我们对美国支持以色列、遏制伊朗的政策有了深入的理解。

(三)主流建构主义坚持了发展观, 不仅承认

<sup>\*</sup>收稿日期: 2009- 02- 10

作者简介: 郭丽(1981- ), 女, 湖北襄樊人, 南京林业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研究院助教, 硕士, 研究方向: 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体系结构的存在,还假定国家体系的文化结构是可以变化的,这就更有力地解释了“9·11”事件后美国对伊朗的强硬政策。这主要是因为“9·11”事件后美国与伊朗相互的“共有观念”发生了变化,由友好转为敌对,从康德文化转为霍布斯文化的敌对结构。“9·11”事件后,恐怖主义威胁在美国内部达成了共识,这种威胁的重要根源来自于伊朗,强化了美伊之间霍布斯文化结构。

## 二

鉴于以上对国内外关于建构主义的研究现状和文化因素在外交因素中影响力的分析,本文主要从文化观念因素对美国对伊朗核问题的政策的角度的角度,借鉴国际政治理论中建构主义关于文化身份和国际利益的观点,即观念建构身份,身份建构利益,国际之间基于“共用观念”组成的文化结构构建起了相互之间的角色身份,这种角色身份构建了国家利益,对“9·11”事件以后美国伊朗核问题政策的重新建构进行论述,从中挖掘出冷战后美国对伊朗核问题实行这种政策深层次的文化根源,以更好地理解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并引起读者对文化建构对美国对伊朗核问题政策影响力的重视。以下的论述中,笔者打算从几个方面来澄清建构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解释。

(一)建构主义把社会建构的假设引入国际安全的研究之中,强调社会建构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承认知识(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对于改造国际结构和安全政治的重要性。建构主义的国际危机管理理论有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概念是“安全共同体”,可以理解为路径依赖和社会建构,它既有物质的基础也有规范的基础。国际危机管理可以通过共同体而不是权力来实现,因为有效的国际危机管理是可以建构的。亚历山大·温特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sup>[4]</sup>他认为,国家可以建构安全困境,同样也可以建构安全的共同体,从而实现对国际危机的有效管理。另一个概念是“安全文化”,认为国家利益是由反映了一定文化因素的行为体来界定的,这并不是说权力就是物质力量,它对于分析国家安全并不重要。<sup>[5]</sup>

对于美伊在这一问题上“敌人身份”的形成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安全观的不同构建所造成的,并不能简单归因为制度、宗教方面的原因。<sup>[6]</sup>笔者认为,美国和伊朗在敌人身份文化构建上很大程度是由于美国和伊朗在安全观构建上的不同。美国的集体安全观带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来构造国际安全体系,而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在指导对方政策中难免有宗教意识形态色彩。

现实主义安全观认为: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者,国际事务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发生。在分

析国际政治的本质特征时,现实主义强调,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在国际间关系上不存在公共权力、法律和道德规范,这必然导致国家间相互猜疑和对对方意图进行最坏的分析。由于缺乏信任,每个国家都面临着自助形势,即国家主要依靠本国的各种资源和能力参加国际间的权力角逐或生存竞争。自助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唯一途径,但自助又使得其他国家变得不安全。结果,每个国家都处于一种战争状态,即统称的“安全困境”。而安全困境的核心就在于,一国安全的增强导致其他国家安全的削弱,不是由于想象和错觉中的敌意,而是由于国际政治中的无政府状态。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对中国、苏联发展核武器的警觉,以及在20世纪末对朝鲜、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反感和遏制,都是这种由于国家间构筑的自助体系对美国形成了一种威胁,也即一个国家核能力的增强导致其他国家安全的削弱。结果,国家间相互作用的本质必然是冲突。用摩根索的话来说就是:“不管国际政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权力总是其直接目的。”<sup>[7]</sup>大国之间都在追求凌驾于其他国家的核权力,这才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手段。

在安全困境下,秩序从何而来?和平如何得到保障?现实主义认为,安全困境从根本上是不能得到根除的,只能加以“改良”,并且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均势政策。这种均势政策在美国外交中最深刻的体现就是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美国创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目的是试图维持一种国家间核力量的均衡,对那些试图取得核优势、试图打破核均势的国家进行联合抵制。

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对待由核问题引发的国际危机上,通常根据现实主义观念,对其他国家发展核技术实行双重标准,结果引发地区局势不稳。如,美国对以色列、印度发展核技术的默许与纵容,对朝鲜、伊朗发展核技术的打压态势,其结果只会引发地区冲突与战争。

与美国外交有很大不同的是,伊朗外交含有某种理想主义成分,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念和共同规范,以保证国际社会具有和谐的品质。霍梅尼主张泛伊斯兰主义,梦想建立“世界伊斯兰政府”,宣称“将向世界各地输出我们的革命”,为此伊朗当局成立“全球革命部”,联络和支持世界各地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运动。<sup>[8]</sup>伊朗作为中东唯一由教士掌权的国家,在2004年2月举行的伊朗议会选举中,还出现了一股引人注目的新保守派,并在议会292个席位中夺得至少80个席位。其主要成员基本上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时任德黑兰市长的内贾德。2005年6月,内贾德意外当选总统,进一步巩固了伊朗宗教保守势力的地位。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伊斯兰主义,其国际政治观也充满了理想主义成分。

内贾德力图改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他屡屡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恃强凌弱”,在核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特别是严厉抨击美国霸权,甚至称美国总统布什是“当今世界的暴君”。为打击美国霸权,建立新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伊朗宣布在2006年3月20日成立以欧元作为石油定价和交易货币单位的伊朗石油交易所。这种举动是对美元乃至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严峻挑战。此外,伊朗还主动联络委内瑞拉、朝鲜、古巴、叙利亚等国,试图“联合反抗帝国主义”。<sup>[9]</sup>

美伊之间的矛盾是两种文化观念建构之间的矛盾,这种文化建构分别是以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外交理念为代表,在对伊核问题上难免发生分歧,美国要求核力量按照他的构想进行均势建构,而伊朗的理想主义外交不可避免地美国的现实主义核政策发生冲突。

(二)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冲突实质上是属于建构主义所认为的两种文化体系的冲突,即以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为主导的康德文化体系和以美伊敌人为特征的霍布斯文化体系。

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安全程度与无政府文化有关。亚历山大·温特概括了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这三种体系文化构成是由行动者之间的角色建构决定的,国际体系中存在三种角色建构:敌人、对手、朋友。“敌人角色建构霍布斯文化,竞争对手角色建构洛克文化,朋友角色建构康德文化,只有霍布斯文化才是真正的自助体系,国家的死亡率很高,国家的安全系数很低。洛克文化的逻辑与霍布斯文化不同,因洛克文化的角色建构是竞争而不是敌对,竞争的基底是主权。”<sup>[2][35]</sup>行为体的安全受国际体系文化的约束,行为体的安全程度与他们所处的体系文化类型或角色建构密切相关。“敌人”之间以霍布斯方式行动,国家安全程度最低;对手之间以洛克方式共处,国家安全程度较高;朋友之间以康德方式互助,国家安全最可靠。敌人、对手、朋友,国家角色的不同使国家安全呈现出不同的生存状态。

以集体安全为核心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实质上就是温特所描述的康德文化,就是在面临严峻的核扩散安全威胁时,各成员国共同应对,并在成员国内部达成安全法则,即不首先使用或研制核武器并承诺不扩散核武器。而美伊自伊斯兰革命以来的敌对状态处于一种霍布斯文化状态。在敌对状态下,国家利益是防范、威胁、征服甚至消灭对方,生存和安全高于一切,国家会动用一切力量扩军备战,取得军事优势,消除安全威胁。在外交决策和实践中总是作最坏的考虑,时刻提防他国消灭自己。两者之间的行为都被视为对对方不友好,并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美伊之间在核问题上的对立正是以康德文化

为特征的国际核不扩散安全机制和以美伊敌对为特征的霍布斯文化之间的对立,其中任何一种文化都无法把另外一种文化纳入到自身的体系中。伊核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这两种文化体系是否会朝着另一方转化。但从目前而言,这种转化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美伊之间的敌人角色和康德文化所要求的朋友角色是短期内不可调和的矛盾,两国长期敌对,缺乏信任,不可能很快被同化入康德文化为特征的安全体系中。

(三)建构主义在解释伊核问题上的确具有很大的解释力,但这种解释力是有限的。

按照建构主义理论,社会规范不只是规定和限制了行动者的行为,而且还建构了行动者的身份,使行为合法化,并定义了行为体的利益,由此而决定了行动者的行为。社会规范对行动者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社会化的机制来完成的。社会化一般包含两个方面,即新的行为体进入新的环境,通过学习和适应,然后把环境中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加以内化。对于国家来说,由于它是团体行动者,其社会化的过程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个是国际社会层面,即国家的跨国社会化过程;另一个是国内社会层面,即社会社会化。外交政策的决策者在国际层次上,通过社会化过程把由国家间所共享的国际规范加以内化;在国内层次上,把国家内部公民所享有的社会规范加以内化。

建构主义除了用规范的概念来分析国家的对外行为外,还把身份(认同)作为理解国家行为的一个重要概念。温特是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定义国家身份,即身份是在国家互动实践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属于国家身份的外在层面。从国际层次的角度考虑,国家的身份基本分为敌人、对手和朋友三种。不同的角色会赋予国家不同的利益,而不同的利益将规约国家的行为。

但是如果用建构主义解释外交政策,是存在一定缺陷的,“如同新现实主义一样,体系层次上的建构主义仍把国家看作是单一的行为体和一个黑箱,国家的身份和国内的实践没有关系,或者从分析的角度把国家身份的国内建构搁置起来。”<sup>[10]</sup>在分析美国对伊朗核问题政策中,如果按照建构主义来解释伊朗的外交政策,就造成了我们无法解释国家核不扩散机制在世界范围内变成了国际规范而伊朗却仍然排斥在这一国际规范之外的原因。

这是因为:建构主义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国家作为自组织的单位,它的认同可来源于国家内部的建构,也就是说国家在体系层次上互动之前,是具有自己身份的,即国家身份的内在层面。这种身份的建构是国内具有不同角色概念的集团讨价还价的过程。”<sup>[11]</sup>决定国家内部身份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共同的文化和国内的经济与政治体系。共同的文化包括语言、习惯和宗教,国内的经济与政治

体系是指自由/民主还是自给/专制。国内政治的发展如战争、革命和制度安排等会改变国内集团的权力配置。至于哪种认同最后占据主导地位则取决于不同组织在国内的力量分配和其所面临的内外环境。一般来说,最有实力的组织或个体会把它们的观念和认同强加到法律、政治和社会结构之中,并使之制度化,一旦这种文化被积淀为社会事实,就会对国家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我们能够定义国家的团体身份,我们就能清楚在国际体系互动之前,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样,国家的互动方式就能确定是肯定的认同还是否定的认同。由此,国家内部的身份建构就成为体系层次上社会身份形成的重要自变量。“这种对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解实际上突破了温特对认同分析的体系视角。温特只从体系层次上探讨了国际社会结构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而没有分析国家内部的身份建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sup>[10]</sup>对国家身份的国内因素考察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体系理论的不足,也是分析国家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从而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国家的对外行为和国家利益。

国家身份的形成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互动的过程。国内层次的身份变化会影响国际体系层次上国家身份的变化,反之,国际体系层次上身份的变化也会影响国内层次的身份变化。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国家的身份或者会强化,或者会遇到危机。而这种身份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政

策与国际体系的变化。外交政策是一种社会建构,是国家对它的理解。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是建构主义所描述的“国际规范”,但是,伊朗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社会化”入这种规范,建构主义并未能很好解释其原因。这是因为:国家作为自组织的单位,它的认同可来源于国家内部的建构。分析伊核问题必须分析伊朗内部国家角色构建,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何伊朗并未纳入国际社会推行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这个“国际规范”。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非世俗化,对整个社会进行伊斯兰改造。建立伊斯兰政府是伊朗非世俗化进程中的首要内容和最为关键的方面。伊斯兰政府与立宪君主制、共和制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由人民代表或君主立法,但在伊斯兰教中立法权与确立法的权限只属于真主。伊斯兰教教义精神对伊斯兰政府领导人都起着主导上的规范作用,伊朗国内缺乏与国际规范认同的机制。从国家制度上,神权是国家政权的最高核心,伊斯兰教教义在原则上倡导一种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地位。这和美国所倡导的维持有核国家的核地位和防止无核国家取得核武器的“非平等”的国际规则相抵触。反之亦然,国际核不扩散规范的建构并未纳入伊朗“国家身份”的建构中,在伊朗核问题上,公民社会组成的社会规范对伊朗国家角色的建构起了主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M].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

[ 2][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3]秦亚青.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 21

[ 4]AlexanderWendt. Anarchy Is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Construction of PowerPolitics[J].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1992( 46): 56.

[ 5]陈先才.西方国际危机管理三种理论模式之比较[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6): 37.

[ 6]赵伟明,杨明星.美伊核博弈的建构主义分析[J].现代国际关系,2005( 7): 20- 27.

[ 7]Hans J. Morga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5.

[ 8]李春放.论伊朗现代伊斯兰政治模式[J].历史研究,2001( 6): 155- 156.

[ 9]田文林.伊朗为何选择革命主义外交政策[J].学习月刊,2006( 12): 47.

[ 10]袁正清.建构主义与外交政策分析[J].国际关系理论,2004( 9): 10- 11.

The US Research on Iran Nuclear Policy after “9· 11” under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GUO Li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37, China)

**Abstract** Since “9· 11”,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have been in conflict on the nuclear issue due to the different cultural constructions. This difference is caused by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bout the realistic concept of collective security held by both parties. The conflict on the nuclear issu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s essentially the conflict of two different cultural systems. Constructivism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iplomatic policy ignores the internal facto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which is difficult for Iran to incorporate into the so-called no nuclear proliferation “international norms”.

**Key words** United States; Iran; nuclear policy; concept of collective security; Constructivism Theory

[责任编辑: 晓 春]